

杨虎城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之底蕴

贺伯清^① 任培秦^②

(^①西安交通大学历史研究所,西安 710049,男,59岁,教授)

(^②西安交通大学历史研究所,西安 710049,女,40岁,讲师)

摘要 六十多年前,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国内形势出现了重要转折。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首先具有深厚的阶级底蕴。这支部队的最早班底,都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有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思想,存在着革命性。其次,十七路军不断追求进步,接受进步思想和主张,追寻、顺应时代潮流,这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底蕴。第三,十七路军中凝聚着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受爱国主义思想的总趋动,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动,体现了十七路军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关键词 十七路军 西安事变 杨虎城

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亲自创建和培育起来的,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六十多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这支部队与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底蕴。本文试就这一方面作些探讨。

一、深厚的阶级底蕴

追根溯源,从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来看,这支部队的最早班底,从司令到士兵,或为贫苦出身,或有悲惨的境遇,都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有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思想。这是这支队伍走向进步,发动西安事变的最深厚最基本的基础。

杨虎城将军出生于陕西蒲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伯父虽是农民、在清末产生革命思想,并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清政府多次搜捕未获,于是抓来杨虎城的父亲顶案,并在西安处以绞刑。后来,其伯父也被捉去打死。十五岁的杨虎城,搬尸归葬,奔走数百里,受尽了人间辛酸,从小产生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刻骨仇恨,孕育着反抗斗争的思想。杨虎城与贫苦的乡亲们商议,决定组织起来,“抗粮抗债,打击豪绅”。^[1]他们成立了农民秘密组织“中秋会”,提出了朴素的政治纲领“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开始投身于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由于杨虎城“担负赡养母弟

之责,并负有父亲生前身后的债务”,^[2]他所受的压迫,超过了一般农民所受压迫的程度。这使他从青年时起就铸就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凭着“中秋会”的力量,他袭击催粮催款的衙役,打跑了下乡逮捕中秋会会员的差役。为了打击农村恶霸势力,他组织一批贫苦农民,打死了依靠官府、包讨债务的恶霸李楨,为民除了一害。为了躲避县府搜捕,杨虎城与参与此事的中秋会的部分青年农民,开始到处流浪。这些人便成为他的基本群众,跟随他从事抗暴斗争。后来,杨虎城率领他们劫夺了反动官府由澄城经蒲城解往西安的一批税款,并川此买了步枪。有了武器,更加敢于和县府军警进行武装斗争。杨虎城就是这样,率领贫苦出身和有悲惨命运的农民逐渐从自发的农民抗暴斗争走上组织的武装抗暴斗争的道路。

跟随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特别是最早的骨干力量,也多来自贫苦出身的农民。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赵寿山,出身于穷佃户家庭,一家人靠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为地主家做杂活。父亲因地主中途收回土地,被活活气死。赵寿山“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3]杨虎城将军在讲这支部队发展时明确说:“十七路军是由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合而成的。”^[4]这支部队在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方面,表现出了朴素而强烈的阶级仇恨,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巨大的动力。”^[5]尽管十七路军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不

少非贫苦农民参加,其内部也曾不断分化出右翼势力,以至先后背叛了十七路军,但是,杨虎城将军认为,“他们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他们走后,我们的部队“更纯洁了。”^[6]这就是说,无论怎么变,贫苦农民群众始终是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最基本的根基。这也就是这支部队能艰苦奋斗,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基础,是杨虎城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的深厚的阶级底蕴。

二、追寻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底蕴

追寻和顺应时代潮流,是杨虎城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底蕴。这支部队始终坚持追求进步,追寻时代的潮流,“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7]

“中秋会”成立后,就开始了反清斗争。他们缴获豪绅的武器,发展自己的力量,至辛亥革命前夕,“该会已发展到数百人之多”。^[8]武昌起义爆发后,杨虎城率领“中秋会”参加了辛亥革命,隶属秦陇复汉军,成为陕西反清的革命队伍。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杨虎城看到人民仍不能安居乐业,于是重整队伍,投身反袁斗争。当陕西督军陈树藩通辑同盟会员李岐山、杨仁天等人时,杨虎城保护他们并拒绝将他们交出,后来陈树藩对杨虎城采用官禄利诱,杨不为所动,并且说“护国为民,革命为义。”袁世凯称帝,陕西出现了讨袁运动。杨虎城在陕西同盟会员的影响下,率部截击袁军,取得胜利,缴获枪枝弹药。战争结束后,军队整编,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杨虎城率部参加了响应护法的军队——靖国军,被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在粉碎陕西督军陈树藩围攻靖国军的斗争中,杨部“东挡西杀,作战最多,也最活跃。”^[9]当北洋军阀对靖国军采取分化与收编,靖国军大部接受改编时,杨虎城部队拒绝受编。他说:“靖国军是为救国的,保全革命人格要紧。”他坚持靖国军旗帜,与于右任在武功重新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在与直系斗争中,为保存实力,杨虎城率部转移陕北,进入同盟会成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防地。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井岳秀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5年,杨虎城部被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第三师与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坚守西安八个月,以不足一万人的兵力打退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阻止了刘镇华镇嵩军向西北发展,保全了西北基地,为

西北军队出关参加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1927年,杨虎城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第十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1930年,这支部队先后扩编为第七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任军长兼十七路军总指挥。这时,杨虎城部队虽然脱离冯玉祥集团而跟随蒋介石,但是他与蒋介石的分歧矛盾仍然存在,以后也越来越大,以至在反日的态度上出现根本对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主义,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杨虎城将军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变成了抗战与投降,救国与卖国的斗争,而且日益尖锐,不断激化。蒋介石不准抵抗,他对抗蒋令,支持陕西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令军警暗里帮助学生。蒋介石要他“剿共”,他巧妙地采用名“剿”实不“剿”,假“剿”不真“剿”,甚至实行名“剿”暗助的方针。1933年6月,与川陕红军达成的秘密协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先驱。西安事变前,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纷纷向杨虎城将军表示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意见。他们“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战场上。”^[10]他们要求杨虎城将军率领他们上抗日战场。此时,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杨虎城十七路军顺应了民意,追寻着时代潮流前进,发动了西安事变。

杨虎城十七路军顺应潮流,追求进步,还突出地表现在坚持与共产党接触和合作上。由于十七路军是从贫苦农民的自发组织“中秋会”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容易接受共产党反对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主张,接受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屡遭挫折后,杨虎城带着困惑撤退到榆林。在这里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魏野畴。这是他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使他“了解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革命思想”,^[11]对中国革命前途也有了新的认识,为他以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杨虎城整训部队,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派少数人去黄埔军校学习,同时开办了一个教导队。对进步知识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中不少人成长为共产党员,张汉民、孔从洲、刘威诚等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担任杨部团、旅、师等职,为杨虎城的救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杨虎城将军在陕西执政期间,抵制蒋介石的思想禁锢政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主张各种学术,“包括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在内,都可以公开讲授,书籍任人阅读,任何思想都不犯法”。^[12]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为陕西人民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允许

谈抗日,而杨虎城将军在陕西提倡爱国自由、抗日自由,而且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和部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他在创办尧山中学时就明确提出,“教职员必须是进步知识分子,有了进步的先生,才能培养出进步的学生”,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宣传抗日自由原则”。^[13]杨虎城又一直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前,在其部队内,始终存在着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在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时,杨虎城聘请了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等共产党人提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和政治教官,培养了不少进步青年军官。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大肆“清党”,杨虎城部违抗“清党”命令,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他将难以在陕西立足的魏野畴收留在军中,后来南汉宸、蒋听松也来到杨虎城部队,随后他们一同到安徽太和县。杨虎城将军大胆重用军中的共产党人,蒋听松、魏野畴、寇子严、曹力如曾担任要职,南汉宸担任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校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这表明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合作并没有因国共合作的破裂而受到影响,相反在白色恐怖下他仍坚持与共产党的合作。

杨虎城将军在与共产党人密切交往与合作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他曾申请加入共产党,曾向南汉宸提出将第十军逐渐改编为工农红军,彻底改造部队的愿望。中原大战之后,杨虎城看到各派军阀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和蒋斗争,“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方”。^[14]此后,他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他邀请共产党人南汉宸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对南深为信任,一切行政方针计划,多出南手”。^[15]杨虎城认为,“共产党无畏无私,个个精明能干。我们的部队是封建的老底子,干部太落后,我们需要共产党员的血液。另人害怕共产党人,我是欢迎的”。^[16]杨虎城的部队内,始终有一批秘密活动的中共党员。在特务第二团(团长为共产党员阎揆要)内,有共产党员200余名,被称为“共产党的干部仓库”。除南汉宸外,许多共产党员在杨虎城的军政文教部门都担任过重要工作。如张汉民、武士敏、王泰吉、蒋听松、宋绮云、杨明轩、习仲勋、汪锋、常黎夫、孙作宾、吕剑人、刘威诚等。1933年,杨虎城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通过部下与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共产党员许权中联系,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派去一些青年军官,充实了许师的实力。树立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共产党友好相处的典范。

总之,杨虎城十七路军不断追求进步,接受共产党

进步思想和主张,追寻时代潮流,成为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的思想底蕴。

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总驱动

在杨虎城十七路军中凝聚着的最深厚的思想是爱国主义,他们发动西安事变,就是这种思想的总驱动。

杨虎城将军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坚定的抗日决心。“济南惨案”发生后,他曾向于右任表示:“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17]杨虎城抱有坚强的抗日决心和誓雪国耻的雄心壮志。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要求南京政府抗日。9月23日,他发出泣告全国通电,指出“日本对我主义,素以强暴凭凌我国。”通电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提出“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他呼吁“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18]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杨虎城是第一个提出“摒弃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将领。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又逼近长城各口。杨虎城到石家庄见蒋,请缨抗战。蒋介石对此非常冷淡,表示“中央自有整个计划”,要他专心“剿共”,不要多管闲事。杨虎城将军“从此意识到希望蒋介石抗战是靠不住的。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他和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19]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杨虎城将军深刻认识到:“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20]才有出路。于是杨虎城将军在十七路军中办起了步兵训练班,在中下级军官中进行爱国抗日的教育。后来,将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1936年6月底,他与张学良一起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两军中现任连长至团长级军官。“训练的目的在于改造思想,准备抗日。”^[21]十七路军广大官兵抗日的要求强烈,他们表示,“打死一个日本人,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面目见先人。”^[22]他们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结束内战。不久,杨虎城十七路军同共产党停止了敌对状态,统一战线基本形成。随着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实现,杨虎城十七路军和张学良东北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十七路军解除了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押了蒋系军政要员,为逼蒋抗日做出了贡献。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将军向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发

(下转第68页)

是接受价值、得到价值,使价值得以在自己身上实现的一方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价值的主体。

例如,在“人一馒头”、“牛一草”这两对价值关系中,馒头和草都具有充饥并转化为能量这样的价值;人吃了馒头,牛吃了草,就可以得到馒头、草所具有的充饥并转化为能量的价值,使馒头、草的价值得以在人和牛身实现;因此在这两对关系中,人和牛都是作为价值接受者、享用者的价值主体,尽管牛和草对人来说都是物,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的客体;这也就是说,尽管牛与草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成为物一物关系或客一客关系,但这并不排斥牛在牛与草之间的价值关系中成为价值主体。

五

价值须在关系中才能确立,其中势必具有或承担着价值的一方,不管这一方是什么,只要发挥其价值而使其在另一方身上得以实现,此一方就是作为价值的提供者的客体。

还有“人一馒头”、“牛一草”为例,馒头、草具有充饥并转化为能量的价值,从而是价值的具有者、提供者,并因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客体。再以“老师一学生”为例,老师具有传授知识、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价值;

尽管老师是某种意义上的主体,但在这里,同草对牛是价值客体一样,对学生来说也是作为价值的具有者、提供者的价值客体。

六

综上所述,如果把价值客、主体分别理解为价值的具有者、施与者与价值的接受者、补充施于者,那么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或是非生物,只要在一定的关系中施予价值、提供价值,那就都是价值客体;只要在一定的关系中,被施于价值、接受价值就都是价值的主体。

如果把李连科等主张的“主体一客体”的价值研究模式中的主体、客体理解为上述广泛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把赖金良等提出的“自然中的客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中的一个“客体”理解为相对于另一个“客体”而方的主体(虽其相对于人而言又可以是客体),把“社会中的主体与主体的价值关系”中的一个“主体”理解为相对于另一个“主体”而言的客体,那赖金良等提出的“自然中的客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和“社会中的主体与主体的价值关系”就同有超出“主体一客体”的价值关系模式,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非交叉或排斥关系,因而无矛盾可言,双方也无实质性分歧。

(责任编辑 曹雪亮)

(上接第 71 页)

出号召:“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23]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杨虎城十七路军受民族大义的总趋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宁肯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也要去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杨虎城十七路军这支由农民武装发展而来的军队,始终存在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它不仅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斗争的目标,而且同民族的独立解放联系起来。接受进步思想和主张,追寻时代发展的潮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坚持民族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的危机关头,受凝聚着民族大义的爱国思想的总趋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这支部队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走向进步,走向光明。

注释:

- 1 《丹心素裹》,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364
-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638
- 2 8 9 11 12 13 14 19 20 21 米哲沅,杨虎城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3、4、9、14、59、60、49、64、64、78
- 3 4 6 7 10 15 16 17 18 22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回忆杨虎城将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34、256、257、256、205、160、167、92、441、205、450

(责任编辑 霍有光)